

《顾廷龙日记》中的钱锺书

丨 陆阳 文 丨

2022年1月，中华书局出版了由李军、师元光整理的《顾廷龙日记》(以下简称《日记》)。顾廷龙，字起潜，江苏苏州人，1939年7月出任上海合众图书馆总干事，自此随合众图书馆变迁而又先后担任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副馆长、馆长、名誉馆长等职，到他1998年辞世为止，任期长达60年，任期之长未闻出乎其右者。

《日记》收录了顾氏1932年至1984年间的日记，约30万字。虽然这些日记部分年份大量缺载，但1938至1951年部分相对保存完整，记录了顾廷龙经办合众图书馆的详细经过，并涉及他与民国学者、私人藏书家、书商等交往的记录，其中就不乏有关钱锺书(字默存)的记录。另有1953年至1958年合众图书馆、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工作计划、简报、年度总结等全宗材料约9万字，也收录其中，可与日记相辅而行。现将与钱锺书有关记录绎出，可窥当时钱氏情状。



钱锺书第一次出现在《日记》中的时间为1943年2月19日。那一天，正是元宵节，合众图书馆董事之一的李宣龚宴请，钱、顾两人同席。“拨可招午餐，座有陈瀛一、夏剑丞、陈伯治、林某、沈剑知、钱锺书、朱象甫诸人”。不过，钱、顾两人在这一天是否首次见面，并不可断定。一个多月后的4月4日，仍是李宣龚“招食茶点”，钱、顾两人再次会面。很快，两人的关系趋于稔熟。8月15日，顾廷龙归还向单镇借阅的两种诗稿，“便道视默存，并以《鲍庐诗话》借之，畅谈”。看来，此时两人已经有共同语可谈。此后，“默存来”的记录频频出现在《日记》中。

1943年10月26日，顾廷龙“致默存函，索《念劬庐丛刻》”。《念劬庐丛刻》，是钱锺书父亲基博在1931年印行的印本，十二卷四册，辑录晚清知名经学家谭献的著作。少年锺书为其中《复堂日记续录》撰写了序文。他晚年回忆：“《复堂日记》序文，仅忆成于十九岁暑假中，方考取清华，尚未北游。”这篇序文是现在所见到的钱锺书最早的一篇论学专文。

1944年1月20日，“默存来，阅《榕村语录》等”。《榕村语录》是清李光地的代表作，后来钱锺书在《管锥编》中就引用了该书“句法以两解为更入三昧”和王应奎《柳南随笔》“诗以虚涵两意见妙”之说，来说明诗歌语言一字多义的特点，见解颇为精到。

很快，顾廷龙与杨绛也得以相识。1944年3月2日，顾廷龙“访默存，介其夫人杨季康女士相见，先君弟子也”。顾廷龙之父亲元昌晚年曾应苏州振华女学之聘，任书法教师多年，杨绛当是在此时受其教益。



1944年2月1日，《日记》中有了钱锺书向合众捐书的记录：“默存来阅书，赠《苓泉年谱》。”《苓泉年谱》即《苓泉居士自订年谱》，是邑人杨寿枬(“枬”同“楠”)自撰的年谱资料。此后的《日记》中尚有钱锺书捐书的记录。1944年7月5日，“钱锺书来，赠《吴董卿集》”。1946年3月30日，“默存来，赠《周报》”。1947年4月17日，“默存来赠书”；9月9日，“默存来，赠远东教育会议所发刷物”。此外，《顾

廷龙文集》尚有记录：1949年8月23日，“题《百尺楼诗集》，陈庆森撰。庆森为前京沪铁路局长陈伯庄之父。书为钱锺书赠”。

当然，钱锺书向合众图书馆赠书绝不止这些。《日记》所录合众图书馆历年工作报告，就记载了各方捐书的数量。据统计，自1943年7月至1951年8月，钱锺书共向合众捐书108种163册。

除了阅书、借书和捐书外，钱锺书还将一些孤本珍本借给合众图书馆以供抄存。1944年3月9日，“默存来，见借《谭仲修师友尺牍》一册”；8月6日：“访默存，还《复堂师友手札》两册，又借一册”；1945年4月3日，“默存来，见假《复堂师友手札》首册”。谭仲修，即谭献，号复堂，以上三则记录当指合众图书馆向钱先生借、还谭氏尺牍的全过程。后来，张世林在《忘年交》(《刊《群言》1997年4月号)中记顾廷龙叙旧：“钱先生说无锡藏有谭献的书信集，我便请他借来让我们馆抄存。我找人照抄，抄完两本便还，钱先生再带两册新的。大概只剩下两三册没抄了，他去了北京，所以没能抄完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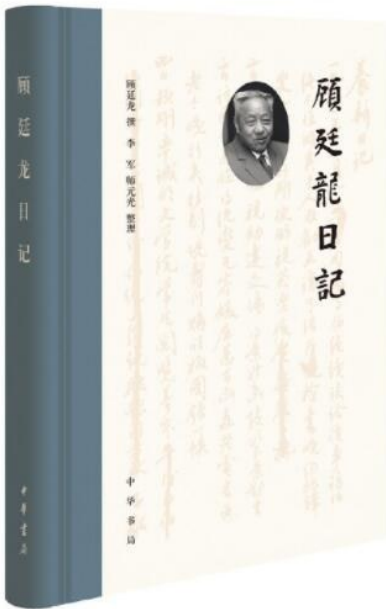
钱锺书的捐赠、供抄之举，自然对合众有匡助之功。1946年1月24日，顾廷龙为“呈为设立合众图书馆申请立案事”呈文上海市教育局，就提及：“……赖有清高绩学若秉志、章鸿钊、马叙伦、郑振铎、陈聘丞、徐调孚、王庸、钱锺书等数十人以及社会潜修之士同情匡助，现在积存藏书计十四万册，正事陆续整理，准备供众阅览。”(见《顾廷龙文集》)



合众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很少，除去几位董事外，实际工作人员只三四人，因而不对外开放。如需进馆参观或阅览，需有熟人的介绍。

钱锺书曾多次介绍好友前往合众图书馆。1944年4月3日，“默存偕其友周君来参观”。周君，是为周节之，系钱先生当时三位拜门学生中的一位。《日记》所录的合众图书馆历年工作报告除了记录购藏、受赠、编纂图书之外，还记录当年前来阅览和参观人士的姓名。在第五年(1943年7月至1944年8月)工作报告中，就有这样的记录：“周节之，钱锺书同来。”

此后，钱先生还几次带人来参观过。1945年12月12日，“默存偕周节之来，同访森老，不值”；1946年3月8日，“锺书偕章克桢来”。



如果无人介绍，来客就得自我推介了。1944年4月6日，“李芳馥来，自介现任沪江大学图书馆长，欲一参观。余知其原任平馆事，近以生计兼职，因许之，导其周览。适锺书在此阅书，遂同谈”。



李洪岩《钱锺书与近代学人》：“抗战胜利后，钱锺书与‘现代中国文学界’以及现代学人发生了大概他一生中最广泛的联系与交往。在此之前与之后，他似乎再没有集中见过这么多中国文化界的知名人士。”从《日记》的记载，也可看到当时钱锺书与文化名流交往的些许情况。

钱锺书与顾颉刚的交往，在《日记》中着墨较多。顾颉刚，早年以《古史辨》而在学界享有大名。钱锺书与他本是旧识。1938年，钱锺书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，而同时顾颉刚在云南大学任教。从《顾颉刚日记》看，同处一城的两人经常一起活动。1939年钱锺书负气离开西南联大，《顾颉刚日记》就记录了他离开昆明的准确日期：7月7日。顾颉刚的父亲去世，他不能返乡奔丧，由夫人殷履安归家料理。那一天，“六时起，与履安料理行装毕，上车站，七时四十分车开。……履安与宾四、锡予、锺书、物华等同行，颇有照应”。

顾廷龙与顾颉刚同宗同族，虽然顾廷龙比顾颉刚小十来岁，但辈分却要高一辈。从《日记》所载内容看，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很多。1945年，顾颉刚计划从后方归来。9月18日，顾廷龙致信于他：“敝馆筹备以来，杜门校理，罕与外接，读者皆系熟识之士，若秉农山、王以中、钱锺书，其他老辈及商界中人，中幸未遭日军检查，地方上亦未经麻烦。”信中提到了钱锺书，而且直言他是不多的合众常客之一。11月18日，顾廷龙致信顾颉刚，其中谈到他欲参加赴日调查遗失文物团事，又提及钱锺书。信曰：“龙颇欲随往，一开眼界……钱锺书君为言于森老(按：徐森玉)，森老板赞成。不意改张(按：张道藩)为首长，且人选由部派

定者，惟森老与钱锺书云，此事全由杭立武主管，渠尚欲为龙设法，已飞笺与杭接洽，尚无回音。”顾廷龙希望族侄替他向杭立武一问，但事情已经定夺，顾廷龙不在调查团人选之列。

1946年5月5日，顾氏叔侄在相别八年后得以见面，“相对欢然”。两天后，顾廷龙即宴请族侄，“午请煨莲、颉刚、振铎、天泽、锺书、森老、揆老、君珊、洁琼”。钱锺书与顾颉刚在上海重新聚首。这一年下半年顾廷龙日记缺失，翻检其他史料，两人还有交往的纪录。顾颉刚9月25日日记有“钱锺书来”的记录，10月5日郑振铎宴请各方友朋，钱和顾氏叔侄皆出席。到了1948年2月2日，《顾廷龙日记》记：“约颉刚明日午餐，邀客郝弼衡、孙蜀丞、钱默存、牟润孙等晤叙”，次日“客皆来”。

东归的顾颉刚与钱锺书在1947年一起被合众图书馆聘为顾问。《日记》所录《合众图书馆议事录》就记录了此事。“5月7日下午四时，合众图书馆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。出席者张元济、陈叔通、李宣龚、叶景葵、徐森玉。主席张元济，书记顾廷龙。讨论事项三项：1.叶常务提根据董事会办事规则第十三条；关于组织大纲第二条第二项、第四项得由董事会聘专家审理之，拟聘专家若干人为本馆顾问，以资请益案。决议：聘专家三人为顾问。通过。2.叶常务提拟聘顾颉刚、钱锺书、潘景郑三先生为本馆顾问案。决议：由董事长函聘之。通过。”3天后的5月10日，“应节之招，席设碧萝饭店，有默存来此偕往，顾问聘书面递之”。

《日记》还有多处钱锺书赴文酒之宴的记录。除了上文所引的两条李宣龚招饮的记录外，1945年12月2日，“应《国文月刊》社邀饮，座由吕诚之、唐弢、曹聚仁、吴文祺、赵泉澄、顾雍如、默存、王以中”。1947年8月1日，“拨可招饮，座有梁思成、温源宁、林崇墉、默存、放园、森老、旭初，尚有一个不识”。10月22日，“默存来，同访西谛(郑振铎)、慰堂(蒋复璁)，商定后日为森老饯行”。11月5日，“森老、默存来。森老为向益明洗尘，邀陪，座有振铎、伯郊。振铎约晚餐，余与默存合请”。还有一次，钱锺书当起了蒋复璁与顾廷龙之间的“传话者”。1946年2月11日，“默存来，达慰堂意，属撰《玄览堂丛书提要》，许之”。当年，顾廷龙果真撰就该《提要》。



《日记》中有关1948至1949年时段的记录，除了1948年初的数条记录外全部缺失。1949年8月24日，钱锺书携妻带女登上火车，离开上海去往北京，从此结束了与合众图书馆之间的直接联系。

离开上海后，钱锺书在《日记》中出现过两次。1950年10月24日，“覆潘景郑、钱锺书”。1951年9月6日，“得钱锺书信，于芬儿远行甚关切”。芬儿，即顾廷龙之子诵芬，此时分配至东北工作。